

作為方法的東亞

甘懷真*

達文西筆下的蒙娜麗莎有可能是中國人，即她的祖先來自中國。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但目前研究已清楚知道十五世紀以後中國沿海之人如何被人口販子掠奪而輾轉賣到歐洲。其實不用等到近代，世界早就是一體了。尤其是歐亞大陸（含周邊的半島、列島）早就藉由交通網絡而連繫為一體，古今差別只在於人與物交流的頻率與速度。國界的存在當然是歷史事實，但這條境界從未阻擋基層人民在歐亞大陸的諸交通線上移動。

過去我們之所以忽略基層人民的移動現象歸因於民族主義史觀。二十世紀是民族國家建構的階段，歷史學受民族國家學說的指引而過度預設今天的民族國家自古以來就作為一個自立、自主的政治經濟單位，而其人民似乎是從土地中自然長出來的。自 1990 年代以來的分子遺傳學（DNA 研究）運用於歷史學研究，現代人如何從東非移出而擴散到全地表已成為明確的事實。我們知道各地域之人都是從境外移入，且在時間流裡因不同時期不同人群移入而形成重層結構。過去中國諺語說「五百年前是一家」，其實也不是完全憑空想像，地表上的人類在十萬年前真的有可能是同一部落。所以二十一世紀的新史學必須超克民族主義史觀，改以世界一體為預設，此一體尤表現在基層人民的跨境移動與融合。

若要用一句話來概括近年來歷史學的發展，就是「作為世界史」。我所謂的「作為世界史」是採用一個新方法觀察歷史上出現的複雜的現象，而不是作為學科分類，如中國史改隸世界史。今天的日本史、朝鮮史都應置於世界史的脈絡中，中國史更不例外。所謂作為世界史的中國史，是要將在歷史中國所發生的諸現象置於世界史的脈絡中探討。如我的專業是中國皇帝制度，此中國王權的現象不是孤立發生在今天的中國，它可能受到北亞的影響，又影響及於東亞的日本、韓國等地。

只是世界史的方法在現階段仍難以操作，因為前近代的世界即使可以被宣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告為一體，其一體程度仍與今日差別太大。故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將前近代的一個世界再區分為複數的歷史世界。如地中海世界、伊斯蘭世界，以及我要說明的東亞世界。東亞作為一個歷史世界，是因為這裡曾有共同的文化要素與一元的政治系統。如漢文是這裡的共同文化，漢文文化圈的西界是河西走廊，東界是日本的房總半島。

多年來，我倡議東亞史研究，核心的理念是「作為方法的東亞」。即我們要將東亞各地域社會置於東亞世界的歷史脈絡中探索，而不只是依今天的民族國家的歷史脈絡。東亞作為一種方法，不是要否認今天這個地區的民族國家的合理性，而是希望能發掘更多的歷史事實，畢竟民族國家是歷史的結果而不是成因。東亞作為一個歷史世界，當然有其共相，但大不同於民族國家藉由認同所形塑的共同文化。東亞世界的形成是某些重要的制度與事件建構了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也創造了它的法則。二十世紀的東亞史研究熱衷探索這個共同的法則，而今天的東亞史 v. 2.0 則是進一步探討東亞各地域社會如何藉由人與物的交流、互動產生共相，此共相又與在地文化互動而產生異相。

又我所戲稱的東亞史 v. 2.0 必須承認複數歷史世界的交疊。若我們說中國、日本與朝鮮共構了歷史上的東亞當無誤，但這些地區又同時屬於與包含其他歷史世界。這又回到世界史的立場。東亞斷然不是封閉與獨立發展的。如我們說皇帝制度是東亞的共同制度，但皇帝制度的形成與幾次重大的轉折又與北亞的歷史變動關聯，如這裡的匈奴王權的興衰。近年來，內亞史研究盛行，我們又知道了中國與內亞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的一個研究熱點是粟特人。中文所書寫的粟特 (Sogdiana) 是位在烏茲別克、塔吉克的古代政權與人群，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元第一世紀。粟特人充分利用他們的地理優勢而成為優秀的商人。在其後漫長的約八百年間，他們源源不絕東向進入中國北部。他們所引入了內亞、西亞文化而成為中國文化。通過粟特人的媒介，中國北部、新疆、中亞、西亞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在約第五世紀到第八世紀之間，粟特語是東亞的三個共同語之一，另二個是漢文與梵文。掀起中國漫天烽火的安祿山 (703-757) 就是粟特人。他就是憑藉著粟特人的特質，尤其是語言的長才，整合了中國東北地區的人群，才能發動「安史之亂」。

「作為方法的東亞」也不只是運用在歷史學，近年來歷史學家也與其他學科的學者跨領域合作。我從 2011 年起在臺大文學院主持一個跨系學者合作的大型計畫，名為「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同樣主題的大型計畫也在中研院、各大學展開，成為近年來臺灣人文研究的特色。這些東亞的研究計畫都將焦點置於各類人群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各種網絡中移

動而發生的文化接觸、互動與交換。在人的移動與訊息的交流中，特定的制度、場所作為媒介，特定的團體作為中介者，特定的文化就利用這些媒介、中介者而跨界移動。於是媒介、中介與跨界成了這些研究的關鍵字，也肯定是未來歷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